

THE EUROPEAN NOBILITY

1400—1800



欧洲贵族

1400—1800

〔美〕乔纳森·德瓦尔德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欧洲贵族

1400—1800

[美] 乔纳森·德瓦尔德 著
姜德福 译

商务印书馆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贵族 1400—1800/[美]德瓦尔德著;姜德福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ISBN 978-7-100-05661-8

I. 欧… II. ①德…②姜… III. 贵族—社会生
活—欧洲—1400—1800 IV. D7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473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欧洲贵族 1400—1800

[美] 乔纳森·德瓦尔德 著
姜德福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66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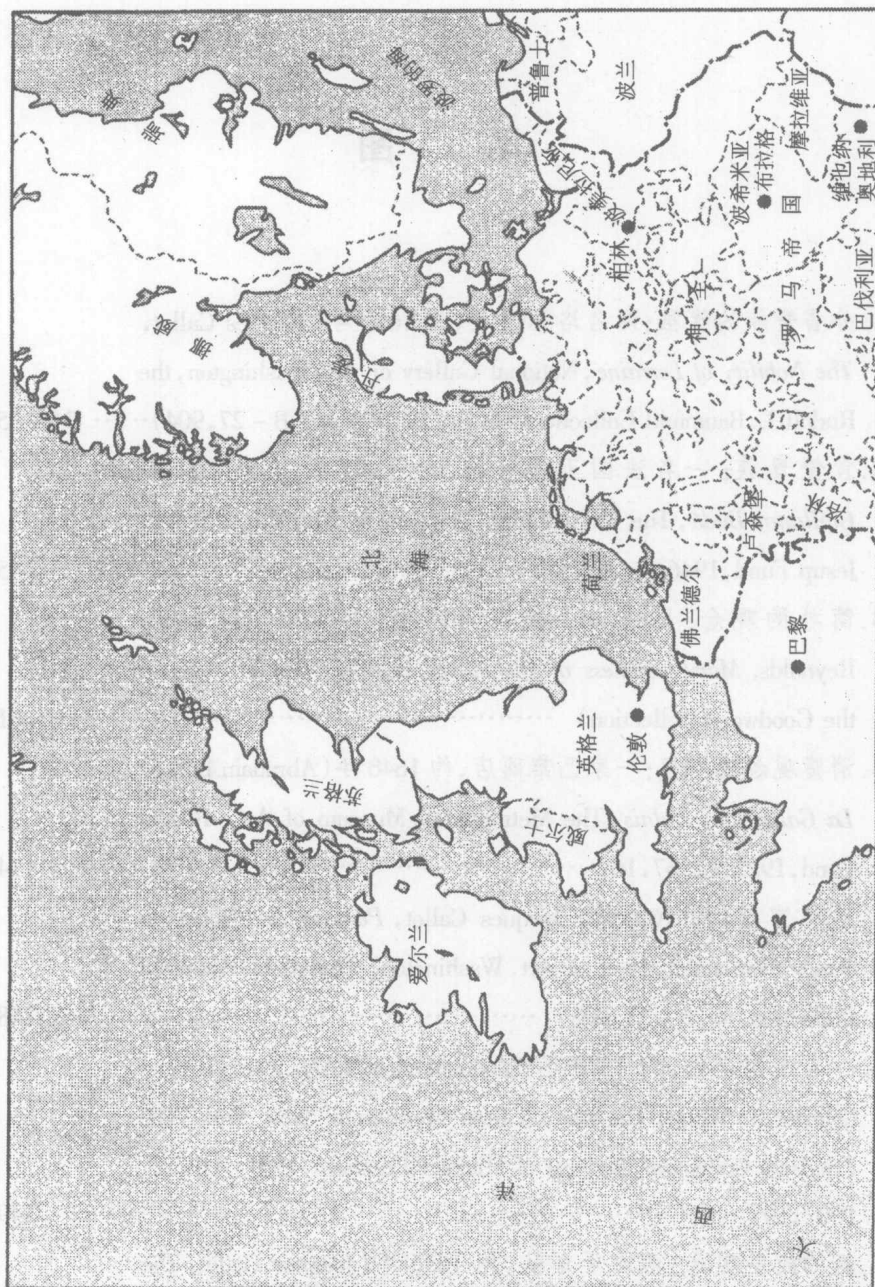
2008年5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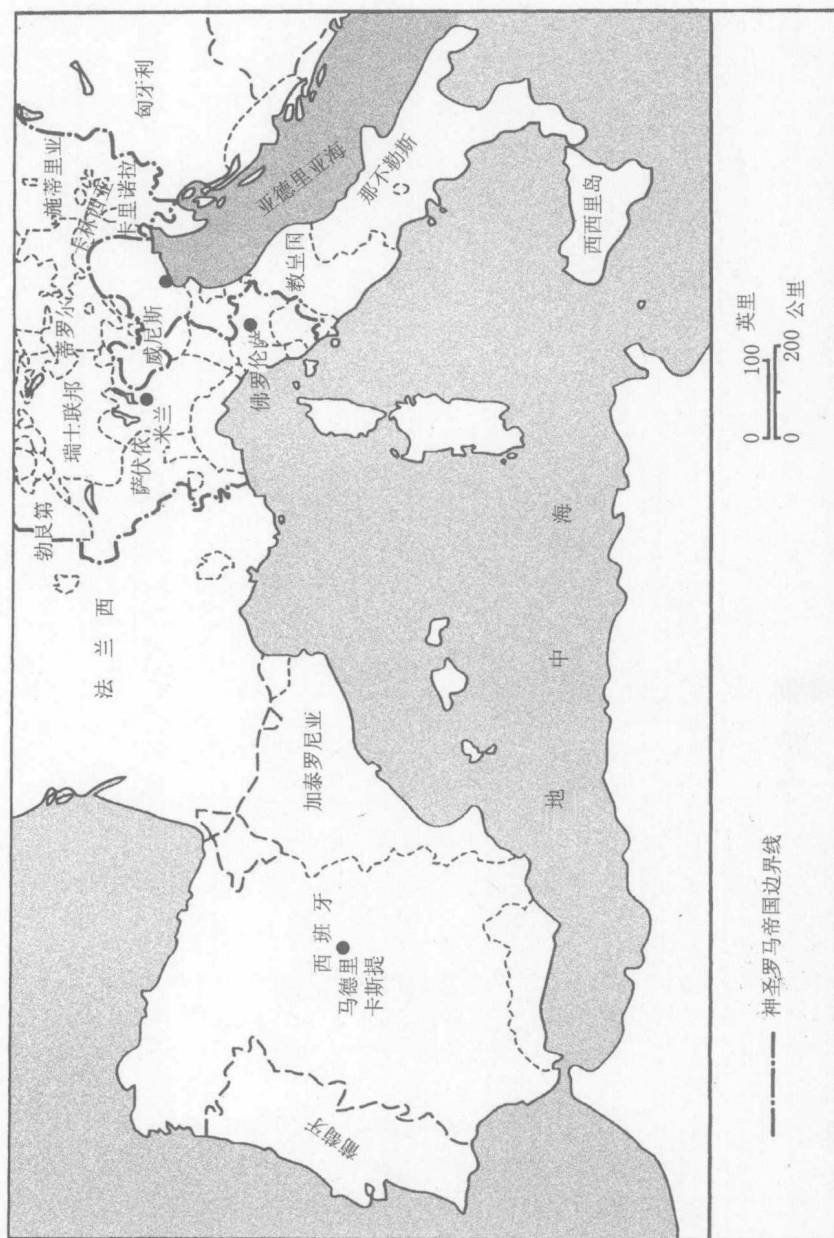
开本 787×960 1/16

200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6 1/4

定价: 29.00 元





1500 年的欧洲

序 言

本书考察的是一个处于自身历史上一段漫长而动荡的时期的复杂群体。像所有的史书一样,要认清这种复杂与动荡的意义,就要做出取舍;本书确定了一些目标,同时也舍弃了一些目标。我在这本书里并未对近代早期贵族进行全面研究,^①没有概述近代早期国家赋予贵族的权限广泛的立法机构,也没有系统叙述他们参与的重要事件;实际上,鉴于他们在近代早期生活中的优势地位,这样的叙述大体上相当于重述这个时期的政治史。许多对贵族的生动描述,许多对我们的情感而言属于“另类”的内容,也未纳入本书的考察范围。在这本书中,几乎没有任何关于盔甲、比武大会、盾形纹章、华丽的表演、骑士之爱的描述;决斗和比武也只是简短地出现。

我在此奉献的是一篇阐释性的论著,而不是全面的评述、叙述或生动的细节,我的目的是弄清在中世纪晚期*到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几个世纪里这一群体的最重要的变迁方式。读者会在书中读到重要事件和惊人的事实,我希望这其中多数显得生动形象,但是,事件和事实主要用于说

① 在英语用法中,nobility 和 aristocracy 的区别很小,时常被忽视。《牛津英语辞典》把 noble 解释为“属于社会中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拥有优越于其他阶层的头衔”——aristocracy 则被解释为“nobles 的统治团体,一个寡头政治集团”,或“构成和国家政权相关的特权阶层的人的集合体;the nobles”。在后面的论述中,我通常按照这一不同的含义,用 nobles 表示整个贵族阶层,用 aristocracy 表示贵族阶层中最有权势的成员。但同《牛津英语辞典》一样,我认为它们的含义部分重叠。

* 中世纪系指 5 至 15 世纪这个期间,专用于欧洲,大体上相当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之间,一般将 14、15 世纪视为中世纪晚期。——译者

** 法国大革命系指 1789—1799 年法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制度,促进了资本主义在法国的发展。——译者

明我的阐释,它们本身并不是目的。那些需要更加系统地纵览事件、立法和骑士习俗的读者,可以求助于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②

xiv 显然,书中这种阐释具有风险,因为没有一位史学家能驾驭关于整个西欧和中欧贵族的历史文献。当然,我不主张,甚至也没有试图将这一分析向东延伸到波兰、俄罗斯和巴尔干各国。然而,冒这些风险似乎也值得,因为,史学家们对欧洲贵族的认识近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长期存在的真理坍塌了,并由此产生了重新评价贵族及其变迁方式的需要。

变迁本身的问题在这一重新阐释的过程中占有主要地位。直到最近,史学家们仍旧围绕危机和转变的观念来构建他们对近代早期贵族史的认识。保守主义史学家们把这一时期视为曾经紧密结合的“贵族社会”衰落的标志,这个社会是通过令人尊敬的首领和粗野的侍从间的契约而建立的,它几乎没有受到市场算计的影响。^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写作采纳的思路惊人的相似。经济变迁(据论证)必然重构社会统治集团:在近代早期,这意味着商人、工厂主和具有商业头脑的地主的兴起,他们能够对范围日益扩大的市场经济做出适时的反应。而第三个集团,即按照韦伯*社会学传统写作的史学家们,尽管角度略有不同,同样强调转变:这些史学家说的是,从普遍存在于自荷马时代**到约1600年间的“野蛮、无知和缺乏自律”(这是这一观点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使用的词)到近代生活要求的比较自律的变革。^④这一“文明的进程”^⑤部分源于新经济的需要,部分

② 这些成果包括: M. L. Bush, *Noble Privilege* (New York, 1983) 和 *Rich Noble, Poor Noble* (Manchester, 1988); 以及 Samuel Clark 即将出版的著作。

③ 关于这一观点的概要,见 Rudolf Endres, ed., *Adel in der Frühneuzeit: Ein regionaler Vergleich* (Cologne, 1991), ix - xi.

*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 德国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 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等著作。——译者

** 荷马时代指公元前11—前9世纪古希腊氏族制度解体的历史阶段, 因反映此时社会情况的主要史料是荷马史诗而得名, 又因史诗描述的是“英雄”的故事, 亦名“英雄时代”。——译者

④ Lawrence Stone,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1641* (Oxford, 1965), 223.

⑤ 这一术语来自 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trans. Edmund Jephcott, 2 vols. (New York, 1978)。

源于近代国家的发展,部分源于新型的宗教与文化。所有这些都要求人们抑制其无政府主义的冲动,如果他们想保住职权与地位的话。在保守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者和韦伯派学者也如此——统治阶级必须在一定意义上成熟起来,必须近代化,以应对近代复杂的生产组织和统治机构。

对贵族史的新探索必须从这一事实出发:“危机”和“转变”现在显然不适于作为描述贵族在这些年里的经历的术语。专家们发现,在欧洲的许多地区,贵族是一个复原力惊人的集团,这个集团在表面上轰轰烈烈的社会变迁中保住了财富和权力。本书强调他们生活中更加重要的延续。^{xv}平民向贵族阶层的流动在中世纪晚期是常事,当时的人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个集团的经济行为早就具有了高度理性的品质,在某种程度上与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品质难以区分。甚至对贵族的批评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可能从未存在过贵族代表欧洲社会中一种没有异议的观念的时期。

这些方面的延续并不意味着贵族的处境在近代早期没有任何变化。相反,贵族对权力和财富的持续控制,需要不断的调整,而且时常是惊人的调整。因此,本书的主要任务是:区分出贵族的哪些情况发生了变化,哪些情况经久不变。我认为,这种区分在许多方面揭示了惊人的事实。本书试图展示:变化和延续在一个统治集团的生活中相结合的出人意料的方式。

如果延续的问题成为本书的结构要点,那么,我一开始就要对书中随处可见的另三个观点加以清楚的阐明。

首先,我认为,在全欧洲的贵族经历中存在着基本的相似性,至少在德国东部和波希米亚*是这样。相似是有限度的。不同的社会拥有数量不等的贵族,授予他们不同的特权。然而,整个欧洲的贵族面对相似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他们应对这些问题的方式也基本相似。在这一研究

* 波希米亚原为日耳曼语对捷克的称呼,6世纪时,属克尔特族的波伊人住在这里,此称呼意为波伊人的国家,广义指捷克全部,狭义指今南、北摩拉维两州以外的捷克。——译者

范围内,这种相似只能通过列举相同的事例来展示(而不是证明),这些事例来自西欧和中欧的不同地区。读者会发现,这些例子中有相当数量来自法国。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失衡反映了我本人对法国的学术兴趣,但它也反映了近代早期历史的重要现实。在那些贵族受到格外关注的社会中,法国并不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法国是欧洲最大的国家,它提供了其他国家效仿的一系列范式,其内容涉及政治和文化。我认为,呈献在此的这一比较,在某些方面表明了这一模仿过程的力量;在其他方面,这一比较表明了整个欧洲共同经历的经济和文化潮流的程度。

第二个观点涉及本书探讨的变迁的起点,即中世纪晚期的社会。我认为,史学家们误解了近代早期的一些变化,因为他们倾向于把中世纪晚期欧洲视为一个传统社会,一个由荷马时代的野蛮和对往昔的崇敬共同统治的社会。如果我们注意到近代早期历史的其他方面,这一时期的变迁问题就会有不同的表现。中世纪晚期社会绝不是如此稳定,以至于使其成员把往昔的习俗看做目前适用的指南;贵族也不是一个牢不可破的集团,以至他们视自己为无可非议的统治精英。我们不能把近代早期看做是贵族的“近代化”时期,因为,就许多方面而言,他们早在1400年就已经是“近代”的了。

本书的第三个主题是将贵族在近代早期经历的最重要的变迁纳入一个整体的描述。我认为,通过逐渐清除其阶层中最贫弱的成员,贵族在近代早期的变迁中生存了下来。中世纪晚期有大量穷贵族,社会为他们提供了体面的位置,通常是充当富裕贵族的扈从,与其分享战争经历和文化。在近代早期,富贵族和穷贵族的这一集合体发生了分裂。要过上当时人认为符合贵族身份的生活,金钱变得愈益必要。正是通过他们的存在,穷贵族已成为这一社会阶层内部矛盾的象征。如今,他们成了无法忍受的嘲笑的对象,而且,由于无法维持其地位,他们愈益被全部逐出这个阶层。因此,在近代早期,贵族数量下降,但其平均富裕程度却有了提高。这是因为,穷困日益阻碍了获得成就和娱乐的途径,如今它们成了生活于贵族阶层的需要。

对这一进程的一种描述是：贵族在近代早期成为一个紧密聚合的社会阶级。这样的程式化描述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阶级的解释，因为，随着时代的进步，贵族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变得更加多样化而不是更加趋同。中世纪晚期贵族的绝大部分收入来自土地所有权；他们的 17、18 世纪后人拥有广泛的投资，有些人则完全放弃了土地占有权。然而，按照对阶级含义的不太准确的理解，我们能够熟练地说出阶级的形成过程。在主要方面，随着近代早期的历史演进，欧洲贵族相互间变得更加相似。他们在收入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减少了，他们开始共享更多的经历和期望。

最后我要说的是，任何以同情心去分析一个统治集团的企图，都有被误解为为其恢复名誉或赞同该统治集团的风险。对欧洲贵族——它对我们自身文化的影响仍旧很强——研究而言，对（本书这类）强调这一集团在文化和选择上的复杂性的研究而言，这个风险特别大。从书中可以明显看出，我也把贵族看做一个凶暴的、剥削成性的统治集团，它的强盛高度依赖于对其他人的高压统治。至少就我们绝大多数人认为的合适的标准而言，近代早期的贵族社会并未提供最好的统治。^⑥但是，对这样一本书来说，谴责这个集团的缺点，显得尤为不当，它限制了我们对此一集团的思想及行为的内在逻辑的认识能力。更糟的是，它纵容了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优点的沾沾自喜。我们有自己的优点，然而就这项研究所考察的社会不平等和权力而论，它们也许是最渺小的。 xvii

最初是威廉·贝克建议我写作此书，而且自那以后，他既给予我鼓励，又提出详细的批评意见。我也感激他的同事——丛书的编辑们——的建议和修改。查尔斯·斯廷格尔以其特有的细心、洞察力和谦和阅读了全部手稿。我从布法罗的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得到的资料支持，极大地有助于这一项目；在那个田园诗般的环境里居住

⑥ 在希腊文中，aristocracy 的字面意思是“由国家的最优秀公民组成的政府”。（见《牛津英语辞典》）

的一年,让我反思并深化了书中的许多观点。

我最感激的是莉娅娜·瓦迪,她给这个项目带来了鼓励、批评和知识。她向我介绍了本书讨论的许多问题和材料,提出不同的解释并且改正了错误。尽管我们在一些特殊问题上有分歧,但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合作项目——因此这也是一种愉悦。

目 录

序言	1
导言 欧洲贵族:一个历史问题	1
第一章 性质与数量	17
种族和身份:生物学上的社会流动	18
流动的过程	21
数量	25
特权	32
受到抨击的观念:对贵族的批评	37
官僚贵族的兴起	42
富贵族与穷贵族	46
贵族的城市化	55
新型绅士	58
第二章 财富、特权、遭遇变迁	69
财富的等级	71
土地与领主权	75
变迁的模式	79
产权的确立	88
庄园管理	94
乡间宅第	102
其他形式的财富	106
报效国家	111
消费支出	112

第三章 贵族与政治	122
地域共同体	124
地域共同体与政治变迁	130
中央政府的革命:君主、官员、臣民	134
宫廷	138
理想与现实	144
反叛问题	152
绝对主义的妥协	160
第四章 生活与文化	170
文化革命?	173
文化庇护与文化创造	179
隐秘心理	186
家族与自我	191
宗教问题	201
启蒙运动的影响	209
结语 走向新社会:法国大革命及其后	215
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230
索引	237

插图

1. 外省贵族的优雅: 两名洛林贵族, 约 1620 年 (Jacques Callot, *The Nobility of Lorrain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the Rudolf L. Baumfeld Collection, no. B - 27, 903 and B - 27, 904) 34 - 35
2. 官僚贵族: 一名法国王室官员, 约 1540 年 (Jean Clouet, *Guillaume Budé*,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Maria DeWitt Jesup Fund, 1946, no. 46.68) 45
3. 简朴的观念: 里士满公爵夫人玛丽, 约 1765 年 (Joshua Reynolds, *Mary, duchess of Richmond*, held by The Trustees of the Goodwood Collection) 61
4. 消费观念的兴起: 一家巴黎商店, 约 1640 年 (Abraham Bosse, *La Galerie du Palais*,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Rogers Fund, 1922, 22.67.16) 114
5. 洛林宫廷, 约 1625 年 (Jacques Callot, *Parterre du Palais de Nancy*,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Rudolf L. Baumfeld Collection, no. B - 27, 908) 148
6. 一名法国廷臣, 约 1570 年 (Monogrammist LAM, *Portrait of a Courtier in White*,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New York, The Friedsam Collection, Bequest of Michael Friedsam, 1931, no. 32. 100.119) 149
7. 新的战争观念: 西班牙军队, 约 1635 年 (Jacques Callot, *The Review*,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Rudolf L. Baumfeld Collection, no. B - 27, 928) 163

导言 欧洲贵族:一个历史问题

1

从中世纪早期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开端,欧洲社会一直为一小群人所统治。这些人就是贵族,在大多数国家里他们占人口的1%或2%,但是,他们占有的社会财富的份额、政治权力和尊敬却大得多。这些特权要求有诸多根源,但从根本上说,它们植根于关于人格和身份的观念。贵族认为自己殊于旁人。他们认为,他们从出生起就继承了特有的品质,他们所受的教育使这些品质得以强化和精致化。他们声称,这种基因遗传和文化遗产的结合,将他们与其他人区别开,并赋予其进行保护和统治的特殊禀赋。这些社会角色反过来又为其财富和荣誉提供了法律依据:由于他们统治其他人,贵族需要尊敬和服从,他们需要摆脱支配普通人生活的物质烦恼。他们认为,特权既是有效统治的前提条件,又是统治者辛劳的适当回报。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这些特权获得了法律效力。一个庞大的法律机构确定谁是贵族及他们享有的权益。因此,贵族通常在法院占有特殊地位,有特殊的条款管理他们的财产事务。

本书概要叙述了从中世纪结束(约1400年)到工业时代的开端(约1800年)期间这些统治集团的历史;在此期间,贵族对欧洲社会的掌控是最牢固的。本书考察贵族的数量和背景、贵族的财富、贵族的日常生活以及贵族在欧洲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本书试图了解贵族对欧洲文化的贡献及其对社会其他方面的更广泛影响。最后一章考察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后的政治与社会变迁对贵族的影响。

这一时期是欧洲历史上的动荡年代。在本书考察的四个世纪里,欧洲人第一次与新大陆相遇,接下来对其实施了日益有利可图的统治。从长远来看,这一相遇使欧洲人的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些

2

变化有着特别大的影响,因为与此相伴而生的还有以下一些相遇:15世纪与希腊罗马知识的相遇,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与新教的相遇,17、18世纪与新科学的相遇。与此同时,欧洲在政治和社会方面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些年里,大多数欧洲国家变得更加强大、组织更加严密、更加集权;大多数经济变得更有活力、更有效率、更加依赖货币交换。到这一时期结束时,工业革命在欧洲一些地区已初见端倪,少数大城市已经具备了近代规模;伦敦人口已达100万,巴黎也将很快达到这个人数。因此,本书这类著作的任务是,将欧洲传统的统治集团——贵族这一通过参照历史为其地位提供合法性的统治集团——的历史,置于其周围世界发生的一系列革命性变迁之中。

当然,没有哪本书能够胜任概述欧洲贵族社会在这些年里的不同经历的重任。即使在最简单的事情上,不同国家的贵族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在东欧和西班牙,贵族随处可见,在西欧大多数国家则为数稀少;他们至少占波兰人口的8%,约占法国人口的1%。对何人属于贵族阶层的界定有着更多的歧义。在英国,只有几百个家族拥有正式的贵族头衔,而其余几千个其他家族则组成了界定宽泛的乡绅,他们的存在完全取决于祖传的家产和良好的出身证明。对余下的大多数地区而言,所有贵族都拥有正式头衔,几乎没有什么法律界线将最显贵的公爵与最卑微的乡绅分开;在这些国家,贵族构成了一个单独的阶层,其成员——无论贫富——声称,他们普遍优越于所有没有贵族血统的人们。对城市生活的态度同样在国家间呈现出差异。在地中海附近,很久以来贵族一直住在城市,而在北方,他们更乐于生活在乡村,只是在17、18世纪才踌躇地迁入城市。贵族的政治权力同样是多变的。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中、东欧贵族拥有西欧贵族梦想不到的地方权力;在其庄园里,他们的统治很少受到外来干涉。与此相反,到18世纪,英国贵族对中央国家权力拥有无可匹敌的控制权,但却极少拥有有效的地主权力。这种多样性使总结欧洲的范式成为一件险事,尤其是在大量基础研究有待进行的情况下。

然而,差异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内容。如果说国家间的差异很重要,那么相似的模式也是如此。在整个欧洲,贵族拥有共同的观念。在欧洲各地,贵族们通过一系列关于其集团的本质和他们为社会其他成员提供服务的共同观念,来证明其特权的合法性。贵族有着共同的经历。实际上,贵族是规模相对较小的集团之一,在近代早期,这一集团的历史是真正欧洲意义上的历史。与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一样——但数量远远超过他们——贵族在全欧洲范围内迁移、求学、游玩和工作。最典型的是,王室联姻将大批贵族遣往遥远的国度,担任新婚公主们的廷臣和顾问。战争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它将贵族长期置于国外环境之中,并且(由于大多数近代早期战争的舒缓节奏)使他们同当地居民进行意义深远的交流。这种人员流动(主要是男子,但也有许多女子卷入其中)反过来又导致了共同情感的产生。关于服饰和行为举止的观念,逐渐为整个欧洲的贵族社会所共享,更为重要的人类生活观念也如此。“所有国家中,有教养的人似乎都一样”,18世纪中叶一个英国人说道,“除了一些细节之外,一位瑞典绅士和其他国家的绅士没有什么区别。”^①贵族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同国家的经历,但它也是欧洲范围的共有模式。实际上,本书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论述这些共有模式的重要性。在整个欧洲,在基本相似的推动力作用之下,贵族们以基本相似的方式发生着演变。

在这些男人和女人的历史中,什么是存亡攸关的事?就一定意义而言,几乎没有。微小的数量使他们在其生活的社会里极不显眼。对这个集团的研究也不能因其惊人的成就而证明自己的正确。在整个欧洲,确实有个别贵族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其才能的发挥与展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欧洲大多数地区,由于他们垄断了高级军政职务,近代早期的绝大多数著名将领和政治家来自贵族集团。许多贵族还积极参与欧洲的文化生活,甚至有许多贵族投身于最具有活力和创新性的欧洲资本主义

^① 引自 J C D. Clark, *English Society 1688—1832* (Cambridge, 1985), 99。